



梦之策

T1 2013年3月11日 星期一

2013斯诺克(中国海口)世界公开赛总冠军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中国龙 中国酒

热烈祝贺2013年全国两会隆重召开!

食品监管:从多段管理到两段管理

百姓能否从此吃得放心

本报记者 李松涛 刘世昕

数天的猜想今天终于证实,食品安全监管将从此进入两段管理时代。

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看,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食品药品监管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4个部门的相关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将聚拢在一起,组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而商务部的生猪屠宰监管职能交给农业部。

这意味着,今后,农产品的监管由农业部负责,而除农产品之外的食品安全监管则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掌控。

这样的一个新格局,在今天成为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讨论的焦点。

“这次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告诉记者,将几个部门有关食品监管的职能归拢在一个部门,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机制,而这个机制关系到基本的民生:让百姓吃得放心。

在最近几年,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苏丹红、孔雀石绿、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注水肉、毒馒头……每一个食品安全事件都会带来极大的震动。

“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监管总局,从食品的生产、流通、使用的连贯链条上进行监管,就是希望让百姓吃得放心。”黄洁夫说。

此前,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分散在卫生、农业、质检、林业、工商、海关等多个部门。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邵明立说:“食品安全分段管理是不科学的,这些年一直在调整。”

正是由于这种分段管理的弊端,2003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变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试图通过这个部门来协调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各个部门,共同解决食品安全监管的难题。

“当时,涉及食品安全监管的正部级单位有7个,而食品药品监管局只是副部级,协调难度很大。”邵明立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认同邵明立的观点。他告诉记者,这些年,一直在部门协调上出问题。

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食品监管从农田到餐桌分成了四段,农业、质检、工商、食药局四个部门分别负责田间、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

但这种监管模式,在基层执行中,遭遇种种矛盾;社会各界也不断有质疑声音。这种调整没有能对食品安全监管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马凯的评价,现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既有重复监管,又有监管“盲点”,不利于责任落实。

造成这种监管困境的,正是存在了多年的分段管理模式。比如一头猪,在饲养时由农业部监管,屠宰时由商务部管理,屠宰之后要盖上各种检验检疫部门的章,进入市场则由工商部门监管,如果加工成猪肉产品还要经过质检部门,最终进入餐馆、餐厅,则由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如果涉及出口,还要经过海关的监督。

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任何一个监管部门都可以推脱责任。

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事件,正是在

这样的监管体制下发生的,而最终的责任回溯则是政府怨企业,企业怨农民,农民怨不法收购商。

“各部门之间的推诿是绝对的,边界还有交叉。”邵明立说。

美国的监管模式一直是邵明立羡慕的。在美国,食品安全监管由FDA从头管到尾,这个机构拥有武器,可以强制执行,还有24小时的拘留权。

但在我国,打破食品分段管理的模式难以做到。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焦红告诉记者,中国目前的国情还做不到一个部门全程监管,因为中国的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太多,把监管集

中到一个部门难度太大。

也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此次的政府机构调整,对食品安全监管还是做了分段管理的处理。在农产品阶段,由农业部负责,原由商务部负责的生猪屠宰也交给农业部。而此后的生产、流通、餐饮环节,统统交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

这就意味着,今后的食品安全事件,将会更清晰地找到责任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后的责任更大了,压力也更大了。

不过,在邵明立看来,此次的调整还是阶段性的,只有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地方政府负起责任,企业树立诚信意识,才最

终能让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认为,光靠监管难以完全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抗生素、瘦肉精等事件都暴露了我国农产品生产初级阶段的监管难题。更关键的是要加强整个农业生产体系的良性运作,既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也加强农产品生产者诚信道德的建设。

“一些农产品质量安全系数较高的国家,对农民使用化肥农药都有严格的限制。农民使用化肥农药都需要有上岗证,他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不当使用农药对农产品安全的风险。”张桃林说,而在我国,农民素质的提升、诚信体系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3月10日,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铁农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互致问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一旁准备落座。当天,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王胜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本报记者 陈剑摄

代表委员呼吁,加强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

行政审批要“瘦身”,更要“塑型”

锐观察

本报记者 刘世昕

这几天,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发言中说的最多的就是,希望政府部门能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给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各个领域松绑。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均瑶集团旗下既有航空公司,又有商业大厦,还有民办学校。在日常经营中,难免要和政府的各类行政主管部门打交道,而跑审批更是绕不过的门槛。

王均金说,他注意到政府部门曾公布说,行政审批取消调整比例已达69.3%。但他个人认为,已经减少的行政审批很多都是无关痛痒的内容,真正体现部门权力的很多审批内容还继续被一些职能部门牢牢地抓在手里。应该说越往后改,难度越大。

也正是这些难啃的改革的硬骨头制约、限制了资本进入市场。

和王均金持相同观点的代表委员不在少数。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就在一次大会发言时指出,“在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2年后的今天,仍有企业家感慨,投资一个项目竟要过53个处、室、中心、站,经100个审批环节,盖108个章,全程需799个工作日……”

赖明还表示,过多过繁且不透明的行政审批,已经成为一些职能部门吃吃喝喝、甚至严重腐败的重要源头。

在今天国务院提交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王均金等关心行政审批改革的代表委员,都看到了中央政府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松绑的决心。方案提出,要从体制机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松绑,激发企业和个人创业积极性。

更具体的改革细节是:政府要减少投

资项目审批,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改革工商登记。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监察局副局长花蓓在此次两会期间的关注点也是政府行政审批的改革。

她说,行政审批中的改、转、放,都

是政府必须做的减法,目的是逐步厘清完善政府同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上项目、做投资应更多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

花蓓代表认为,近年来,对关键领域的行政审批改革力度还不够,必须继续清

理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简政放权,持续“瘦身”。她特别强调,要在减量的基础上,推进审批的“标准化”改革,以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她说,如果减少行政审批是“瘦身”的话,加强行政审批的标准化就是“塑型”。

花蓓说,中央先后多次集中取消或调整行政审批后,今后不会再有批量化、集中式清理。那么,现存的行政审批事项如何更高效,更好地服务企业和社会,标准化必须提上日程。

王均金建议,为加快减少审批项目的进程,可以设立中央改革督查机构,确保中央的改革落实到位,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改革是放权革命而不是分权游戏

曹林说会

无疑,大部制改革是此次两会的重头戏,早在两会前各种版本的改革方案就传得沸沸扬扬,关注和猜测的热情比“人事安排”还高。人们之所以关注此项改革,一是这项改革涉及部委的调整,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二是,相比那些抽象的理念,部委调整是最具体、最看得见的改革;第三,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第一个大动作,由此可能窥见今后的改革走向。大部制改革方案10日出炉,动作不算大,也不算小,与人们的预期和猜测并无多少差别。

媒体的焦点,多集中在这一次的改

革:撤了几个部委,少了几个正部级机构,组建了几个新机构,推成了“末任部长”,新机构设立后的人事安排,原机构的人员安置,谁家欢喜谁家愁,哪个部门的权力大了哪个权力小了,等等。这些信息,确实是新闻,也是公众急于想知道的。但这些都只是浅表层的新闻,最深层的问题并不在此。

很多人都把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看成是部委之间的权力重组。其实,这一次改革并不是部委间的权力重新分配游戏,而是一次放权革命——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民众放权。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马凯在对机构改革作说明时说得很清楚: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

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最大的亮点是放权。

减少了多少个正部级机构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向社会放了多少权。大部制改革,不是让这个部委权力更大,那个部委权力更小,而是系统地向社会放权,减少政府干预,市场能调节的交给市场,社会能自治的交给社会,地方能管理的交给地方。

比如公众关心的铁道部被撤销,某些职能机构并入交通部,并不是将原属于铁道部的权力转移给了交通部,形成一个拥有更大权力的部委,而是实行市场化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这是向市场放权。

还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的合并,并不是将两种权力相加形成一个权力更集中的大部,不是1+1等于2或大于2,而可能是小于2。因为两个机构合并后,很多权力将交给社会。马凯也谈到一些部门职能越位、缺位问题依然突出,不该管的管得过多,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好。机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革政府自己的命,放弃那些“不该管的”和“管得过多”的,集中力量管好“该管的”和“没管好”的。

还有其他职能机构的调整也是如此,都集中于“放权”而不是“分权”,从体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而不是在部委间分蛋糕。比如要“减少投资项目审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对不符合行政

高端访问

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

城镇化,别切断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王晶晶

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命运受到关注。此前,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城镇化不能把文化“化”掉。全国政协委员田青也提醒,别让城镇化在建设时,有一句话,“村庄建设要注意保存乡村风貌”,我想这其中就包括了传统建筑、生活方式还有其他文化元素的传承。”励小捷说。

3月8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城镇化建设中,对于历史建筑,国家文物局的态度是能保留的尽量都保留,因为这是一种历史信息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城镇化加快过程中,和文物保护的矛盾是有的,这个矛盾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不过你注意到没有,政府工作报告在写到城镇化建设时,有一句话,‘村庄建设要注意保存乡村风貌’,我想这其中就包括了传统建筑、生活方式还有其他文化元素的传承。”励小捷说。

“城镇化建设中涉及到文物,都要经当地文物部门规划,进行前置审查。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文物部门还是有话语权的。”励小捷补充道。

但是,这些乡村古建筑很多并不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励小捷曾经在贵州黔东南苗族村寨调研时发现,那边的房子很简陋,都是吊脚楼,但整体风貌保护得特别好。“这就面临矛盾,如果全拆毁盖成小二楼、贴瓷砖,就没有传统民居了。但原封不动,继续风吹雨淋,老百姓居住条件很差,没有上下水,更谈不上暖气,就一个火盆,那些老人行动不便,成天围着火盆,一个个眼睛熏得红红的。”

励小捷说,国家文物局正打算在北方、南方的少数民族村寨选择几个试点,既要保护好古民居,又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少数民族织布的工艺,同时解决他们发展生产的问题。

“有一个村做得特别好。贵州妇女织的小粗布,很有感觉,他们和国际品牌爱马仕联系上了,那边的设计师出图案,原料就用侗族妇女织的粗布。尽管这个村子没有进入文物保护单位,但依然达到了整体保护的。”他说。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扫一扫 看更多两会新闻



中国青年报两会报道媒体方阵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两会专题
新浪、腾讯、搜狐中国青年报微博
两会视频访谈

特刊编辑

吴湘韩 高山
从玉华 陈婷舒
郑琳
图片编辑 赵青
版式设计 杨大昕

许多可规定的,一律予以取消”。在民政事务上的改革也是如此,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是应有的改革方向。如果改革仅仅是部委间分权,在官员间平衡,变成部委间的权力博弈,而不是向市场、社会和民众分权,还可能滋生出更多的问题,改革只是在原地转圈。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曾如此描述机构改革阻力,“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朱镕基说,1997年年底,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可以想到,这一次的机构改革也一定不容易,改革就是自己的肉。中国需要这样自我割肉和刮骨疗毒的改革勇气!

曹林